第 6 卷

勃列日涅夫和安—契过渡时期

[1964年至1985年]

勃列日涅夫上台，标志着苏联进入了新的阶段。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在斯大林时期处于苏联中上层领导地位，他们没有过多参与斯大林时期的违反法制的进程，没有什么历史包袱。同时，他们在赫鲁晓夫时期逐渐走上非常关键的领导岗位，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党和国家的经验。还要看到，他们目睹了斯大林时期苏联一系列不正常的情况，经历了赫鲁晓夫急风暴雨式的改革和跃进风暴，这些都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执政参照材料。就是说，在60年代中期，苏联有可能按照比较正常的现实情况策划改革，实施民众拥护的方针和政策。

勃列日涅夫执政开始，纠正了赫鲁晓夫一系列鲁莽的改革和冒进做法。例如，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除了工业党和农业党的做法；撤销对农民副业的限制，鼓励农民发展个人副业；纠正中央主席团不正常的作风，强调集体领导原则；对知识分子实行比较宽容的政策，缓和了赫鲁晓夫时期与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等等。这些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继续推行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改革政策，如从农业入手，改善农产品采购制度，实行六年固定不变的谷物收购计划；继续倡导“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推行新的经济体制。勃列日涅夫执政前期，苏联经济改革逐渐推进，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时期勃列日涅夫执政风格与赫鲁晓夫明显不同，赫鲁晓夫是以改革和创新为执政基调的，而勃列日涅夫则以维持和保守为执政基调。所以，这时期苏联的经济改革总处于试验状态，最高决策层不准备将经济改革推向深入。更加明显的是，这时期勃列日涅夫将政治体制改革束之高阁，积累了许多问题。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执政前期，苏联在改革方面还有所动作，那么，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逐渐失去了改革的气息，越来越变得保守和僵化。维持现状和粉饰现实，成为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期的执政主调。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国际战略方面咄咄逼人，采取了主动的进攻性战略，谋求世界霸权，与美国争夺全球利益。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苏联 70 年代中期在军事实力方面大致取得了与美国的均衡态势，迫使美国将其视为谈判和竞争对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苏联竭力控制社会主义阵营，并将这个阵营作为与美国较量的砝码。为维持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苏联不惜进兵捷克斯洛伐克，对中国实施武力遏制和核讹诈。

苏联谋求世界霸权的对外政策，极大地限制了苏联自身的改革进程，消耗了苏联综合国力。苏联不实行彻底改革，推行霸权主义政策，致使苏联在 80 年代初期出现了种种危机征兆。

第 42 章

引人入胜的政治变化

（1964 年至 70 年代中期）

第 1 节　赫鲁晓夫下台

决策是一门科学。最高决策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同时，还要看到，国家高层决策是与最高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最高权力就不可能进行最高决策。但是，历史又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掌握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又往往作不出高水平的、高质量的决策。赫鲁晓夫就是一位握有巨大权力却往往作不出高质量决策的领导人。从决策学的原理中可以看出，一贯正确的决策是不存在的，任何领导人都可能作出错误的决策。在社会处于转折时刻领导人不免有失策之处。问题在于，领导人如何避免出现一连串的决策失误，尤其是重大决策失误。因为一连串的决策失误会导致整个社会出现强烈的过敏反应和震荡。这些过敏反应和震荡反过来对最高决策层形成压力，从而导致最高决策层出现政治裂变，出现政治“换马”现象。

赫鲁晓夫一意孤行

公开的对立面已经消失了，赫鲁晓夫可以开足马力在苏联政治的盘山路上飞驰。他在农业、工业和政治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大改组，他把那些混乱的、破坏性的经济改组和政治冲击一夜之间强加给整个社会。鲁莽的改革和冒进的做法，使他失去了原有的支持改革的阶层，同时他的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又冲击了既得利益集团和保守势力。他一意孤行，专横独行，使得他四面树敌。到60年代初期，盲目行动的所有病态都出现了：处女地出现了问题，大片土地风沙化，农业奇迹变成了农业灾难。1958年前，鼓励农民生产的一系列措施到后来却都收回了，农民对此极为不满。工业改组更是乱了套，由条条管理变为块块管理，结果是“地方主义”变为“本位主义”。在文化领域，赫鲁晓夫更是时放时收，翻来覆去。到后来，他终于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严厉的政策，从而失去了知识界的有力支持。赫鲁晓夫同样也失去了军队的信任和支持。这主要是因为他突然单方面采取行动，将苏联军队裁减120万人并削减了军事预算，引起军方不满。赫鲁晓夫还更多地依靠其顾问班子进行决策，从而惹怒了党政机关的负责人。最后，赫鲁晓夫对党的两项改革措施，遭到党内中上层干部的强烈反对。一是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对州委书记和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书记地位是一种威胁，使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失去了稳定感和安全感，所以，赫鲁晓夫与州委书记们之间形成了关系紧张的暗流；二是将州党委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这就导致了各级党的权力的二元化，遭到了州委书记的普遍反对。赫鲁晓夫面对的反对势力不是某几个人，而是不同的势力阶层。在国际上，赫鲁晓夫也处境不妙，古巴危机使赫鲁晓夫失了面子，苏美关系趋于紧张，而中苏关系破裂又使他在国际共运中的声望下降。赫鲁晓夫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当他试图重整旗鼓进行更大规模的改革计划时，一个新的“宫廷政变”又在密谋之中。主谋正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几个门生。赫鲁晓夫时代以“宫廷政变”方式开始，又以“宫廷政变”方式告终。

倒赫鲁晓夫者秋季南方密谋

早在 1964 年年初，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内部就讨论过撤换赫鲁晓夫的问题。这当然是在赫鲁晓夫不知道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这年头九个月，赫鲁晓夫有 135 天在全国各地视察和在国外访问，这就为那些想撤换他的人提供了过多的机会。9 月份，一些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在南方度假时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是应斯塔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费·库拉科夫邀请来马内奇胡地区打猎的。但是，他们却很少打猎或钓鱼，过多的是在密谋如何撤换赫鲁晓夫。这些人中，伊格纳托夫起了重要作用。他曾长期担任苏共中央书记，1957 至 1961 年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但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他与赫鲁晓夫的关系不断恶化，从而失去了自己的高级政治职务。1962 至 1964 年他担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此职没有任何实权，但可以行遍全国，促进反赫鲁晓夫集团形成。

俄罗斯联邦苏维埃主席警卫队长的紧急特别电话

据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后来回忆，1964 年 9 月初的一天晚上，赫鲁晓夫寓所的政府专用电话响了起来。这是俄罗斯联邦苏维埃主席伊格纳托夫的警卫队长加柳科夫打来的。他说他偶然知道了一个反对赫鲁晓夫的阴谋，有许多人参与了这个阴谋。谢尔盖感到有些疑惑，他建议最好打电话给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让克格勃处理这件事。但加柳科夫坚决地说：“我不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去找谢米恰斯特内。他同谢列平、波德戈尔内及其他人一起，是这项阴谋的积极参与者。我想把这一切情况亲自告诉尼塔基·谢尔盖耶维奇。他现在非常危险。”

“过几天再打电话来。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不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是碰巧使用这个专用电话的，并且设法使这个房间只有我一个。”

他要求谢尔盖转告其父亲。后来，谢尔盖在莫斯科郊外同加柳科夫会面。加柳科夫讲述了他如何无意中偷听到伊格纳托夫同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的电话谈话。虽然他只是听到一些只言片语，但是他相信他们计划在 11 月份之前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其实他俩的会面自始至终受到跟踪，因为通往赫鲁晓夫住宅的所有电话都被窃听。

谢尔盖迅速将此事转告了他父亲。赫鲁晓夫问涉及此事的都有哪些人？谢尔盖答道：伊格纳托夫、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和谢列平。赫鲁晓夫让米高扬调查此事。几天后，米高扬找谢尔盖和加柳科夫谈话。他听完加柳科夫的汇报后，明确表示，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谢列平以及其他人，都是忠实的共产党员，丝毫不用怀疑，他们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都奉献给了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我们仍然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战友”。①

莫斯科的行动

赫鲁晓夫南方度假之时，莫斯科的密谋活动正加紧进行。10 月初，在正式召开苏共中央全会提出最后决议之前，中央委员从各地被召集到莫斯科，并分别向个人或小组传达使赫鲁晓夫下台的步骤。在全体 200 多名中央委员中，只有 3 个人不同意预定的决议，他们是中央委员会农业书记波利雅科夫、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托尔斯季科夫和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一个成员。②赫鲁晓夫强有力的支持者科兹洛夫身患重病，没有出席会议。当时

乌克兰的代表试图与赫鲁晓夫通电话,提醒他注意事态的发展,但没有接通。显然，他在黑海别墅的电话系统被控制住了。

倒赫鲁晓夫的主谋是谢列平、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当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也积极支持这个密谋。这样，党、政府、警察和军队系统都站在密谋者一边，排除了出现任何不测事件的可能性。10 月 12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在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的情况下召开会议，部署如何撤销赫鲁晓夫中央第一书记职务问题。最后，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了《关于对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和制定新时期国民经济远景计划提出的有关问题的决议》。这不是一个事务性的决议,而是一个政治性的决议。决议表示,新五年计划出现‘原则性的模糊认识”,引起‘质疑”,因此需要召开由赫鲁晓夫参加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问题。赫鲁晓夫 7 月 18 日《关于农业向集约化过渡的领导问题的意见书》引起许多‘含糊不清的理解”,提出‘不少混乱主张”,故决议表示收回这个意见书。决议还表示，有必要将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召集到莫斯科，通报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的结果。③

10 月 13 日，赫鲁晓夫在南方别墅会见了法国部长帕列夫斯基。这时勃列日涅夫从莫斯科打来电话，通知赫鲁晓夫：中共中央准备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农业问题。赫鲁晓夫听后很恼火，向勃列日涅夫发了脾气。但勃列日涅夫仍坚持要他回来，并告诉他，中央委员已聚集在莫斯科，即使他不回来，中央全会也将如期召开。赫鲁晓夫不得不急忙从黑海边飞回莫斯科。当天下午，当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乘“伊柳辛—18”喷气式飞机回到莫斯科时，情况出现异常。机场上没有像往常那样所有中央主席团委员都前来迎接,只有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和他的一个助手前来迎接。这是不祥之兆。克格勃主席通知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所有的人都在克里姆林宫，等待他们的到来。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这时已经明白了，中央全会根本不是讨论什么农业问题。

赫鲁晓夫的“天鹅绝唱”

紧接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出席会议的有 22 人。除了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外，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以及几位州委书记（其中包括极力反对赫鲁晓夫的伏尔加格勒州委书记什科利尼科夫）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赫鲁晓夫亲自主持，未做任何记录。讨论时，发言者措辞非常尖锐，声称要赫鲁晓夫下台。而赫鲁晓夫则断然拒绝对自己的种种指控和责难。但赫鲁晓夫十分孤立，只有米高扬支持他。米高扬认为：“赫鲁晓夫和他所奉行的和平政策对党来说都是重要财富，对此，不应当加以蔑视。”④这次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仍未说服赫鲁晓夫“自愿”退休。会议休会。

晚上回到家中，赫鲁晓夫思前想后，最后决定停止反抗，同意退休。他打电话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米高扬。

1964 年 10 月 14 日，中央主席团会议继续开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了他政治生活中最后一次政治演说。他说：“总算还有人谈起我工作中的成绩，我表示感谢。”我们大家都受过党的教育。我不会赖着不离开的。如果我工作中表现粗暴，伤害了人，再次请求原谅。对我的一系列指责，我断然否认。我的缺点和弱点是心肠软，耳朵软，也许还有未及时发现自己的缺点，但在座各位谁都从来没有开诚布公地向我指出，而是一味迎合。你们缺乏原则和勇气。指责我身兼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两职，这又不是我自己强求的，是集体决定的，你们中的有些人，包括勃列日涅夫坚持要我兼任的，说这样对工作有利。”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次政治演说了，可说是天鹅绝唱。中央全会上我不再发言了。但我想请求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没等他说完，就一口拒绝：“这办不到。”苏斯洛夫也表示支持：“明摆着的，现在是我们说了算……”赫鲁晓夫十分激动地表示：“我自己就想到过，我

该退休了，问题很多，在我有生之年难以解决。应该推选年轻人。至于此时此地发生的一切,历史总会说公道话的。”现在请起草我的退休声明，我签字。如果需要，我可以离开莫斯科。”⑤

1964 年 10 月中央全会

10 月 14 日下午,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中央委员此前已经从全国各地抵达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宣布会议开幕,并致开幕词。勃列日涅夫的开幕词是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为基本调子的。他指责赫鲁晓夫领导作风恶劣，搞个人崇拜，搞唯意志论，使中央主席团内情况不正常。他表示，现存的局面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希望全会作出决定。赫鲁晓夫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他一言未发。

苏斯洛夫在全会上作了报告。他没有对赫鲁晓夫执政 11 年的活动进行分析和总结，而主要是列举了赫鲁晓夫的个人缺点和错误：

（1）赫鲁晓夫未经深思熟虑，就匆忙作出决定；在组织上频繁撤换干部。在最近几年里，赫鲁晓夫独揽大权，并开始滥用手中的权力；他把国家所取得的全部成绩和成就都归功于自己，根本不把主席团放在眼里，也不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总是教训所有的人。

（2）报刊越来越多地为赫鲁晓夫歌功颂德。仅 1963 年一年，赫鲁晓夫的照片就在中央各报上出现了 120 次 ,在 1964 年里竟出现了 140 次。而当年斯大林的照片一年也不过 10—15 次。赫鲁晓夫把亲属和记者当成其顾问，更多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不是主席团的意见。

（3）赫鲁晓夫把党的领导按生产原则划分，照这样下去就会出现两个党，即工人党和农民党。

（4）赫鲁晓夫把工业管理搞得一团糟，成立许多国家委员会

和国民经济委员会，以致很难理出头绪，现在的工业比以前的管理方式还要差。

（5）赫鲁晓夫推行的价格政策是错误的：提高肉类、奶制品和一些工业品的价格影响了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赫鲁晓夫在畜牧业方面也推行了错误政策，致使大量奶牛被宰杀，肉类产量下降。

（6）赫鲁晓夫在国际共运方面犯过错误，不适当地批评其他国家共产党。

（7）赫鲁晓夫在其他方面也犯了一系列错误。例如，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他不仅一次都没有接见过外贸部长帕托利切夫，而且没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的一些学者不同意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建议，他便决定将该院迁出莫斯科，并说："他们用不着在柏油马路上耕种"赫鲁晓夫还指示苏联科学院为李森科的两名追随者努日金和列梅斯洛留出两个院士空缺。当萨哈罗夫院士在科学院会议上取消这两个人的候补院士资格时，赫鲁晓夫大发雷霆，并扬言，如果科学院参与政治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把这种科学院轰走，我们不需要它"。

最后，苏斯洛夫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够更早一些要求赫鲁晓夫改正自己的错误呢？主席团的成员们这样做了，警告过赫鲁晓夫。可是他们从他那里听到的，只有粗暴的反驳和侮辱性的言辞。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回答。"撤换赫鲁晓夫，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勇气和力量的表现。这件事今后应该引以为戒。"[⑥]

苏斯洛夫的这份报告并不出自他本人之手。据谢列斯特透露（此人曾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搞掉赫鲁晓夫的"英雄"不是苏斯洛夫。苏斯洛夫直到倒赫鲁晓夫活动处于关键时刻才了解底细。当最初得知要搞掉赫鲁晓夫时，他十分担心发生内战。这次苏共中央全会上苏斯洛夫作的报告是别人写的。此报告本应由勃列日涅夫或波德戈尔内来作，但他俩都

没有勇气来作。

苏斯洛夫讲话之后，勃列日涅夫作了简短发言。他建议：我们用不着给自己抹黑。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对赫鲁晓夫职务问题不要进行详细讨论，而在非常大会上只讲在报上公布的内容。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主席团内部发生的问题和在苏共中央活动中恢复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的措施的决议》，对赫鲁晓夫进行了批判，指出赫鲁晓夫犯了一系列错误。苏共中央满足了赫鲁晓夫“因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而提出的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2 月 9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解除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柯西金⑦接任。这个建议是勃列日涅夫提出的。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表示，柯西金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著名活动家，是一位忠于我们祖国利益的优秀组织者。⑧这标志着赫鲁晓夫时代的结束。

第 2 节　米高扬引退

小小的政治变动

作为政治失意者，赫鲁晓夫的命运是最好的。他下台后，没有受到强烈的公开的政治批判，也没有引起重大的人事变动。但变动还是有的，在 11 月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几个重要支持者被罢官，科兹洛夫因“重病”被解除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职务；波利雅科夫被解除苏共中央书记职务；阿朱别伊“由于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被开除苏共中央。

引人注目的是，10 月中央全会上中央主席团中唯一支持赫鲁晓夫的米高扬仍安然无恙。但是，敏感的人已经发现这位元老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新的领导者们口径不同。就在大家一致谈论赫鲁晓夫的错误时，他与众不同地肯定了赫鲁晓夫的长处。

1964 年 11 月，在“红色无产者”工厂召开的一次党内会议上，他说：“我们不能否认赫鲁晓夫的功绩，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在消除个人迷信造成的后果上，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在筹备和主持党的第 20 次、第 21 次和第 22 次代表大会——这样最重要的党的代表大会以及通过党纲方面，他的功绩是巨大的。”⑨

米高扬的独特政治地位

新的“集体领导”并不是“精诚团结”的集体，彼此间勾心斗角。饱经政治风云变幻的米高扬已洞察到了这一切。当时，米高扬担任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这是一个荣誉职务，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不过，米高扬还是主席团委员，他具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传奇的经历和敏锐的政治嗅觉。不仅如此，作为当时主席团内硕果仅存的列宁时代的老战士，他享有特殊的政治威望，所有这些都使他在新的“集体领导体制”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样，在“集体领导”体制内部的权力斗争中，米高扬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他的态度决定着政治权力天平向哪一方倾斜。

米高扬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是黄昏落日，不会有更大的政治作为了。1964 年 11 月，他对主席团的代际关系作了一番分析。他说：“主席团由三代人组成：(1) 老一代的——有我和什维尔尼克；(2) 中间一代的——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3)年轻一代的——有谢列平和谢列斯特，尽管就年龄来说，他们已经不那么年轻了。勃列日涅夫 56 岁，与柯西金同岁。科兹洛夫病得没有希望了。谢列平和谢列斯特都是 48 岁。他们都有做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我 30 岁就当上了人民委员。”⑩

在米高扬看来，苏联政治的实际支柱是中间的一代。而在主席团

的中间一代中，米高扬则更多地倾向于柯西金。这样，米高扬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的不满。不久，米高扬遇到了挑战。

急流勇退

10 月中央全会开过不久，党中央委员会便做出决定，不再允许年满 70 岁的党员在党和政府的工作中担任领导职务。应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在当时其用意是明显的。在 1964 年 82 岁的库西宁逝世后，在主席团中年龄最大的是米高扬和什维尔尼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书记处大多数成员的年龄低于 60 岁。什维尔尼克当时 76 岁，担任苏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这是一项无足轻重的职务。这个新决定唯一受到直接影响的就是米高扬，他到 1964 年 11 月底已经 69 岁了。米高扬马上体会出其中的内在涵义。他不愿在自己辉煌的政治生涯中留下一个黯淡的结尾。于是，他准备引退。

1965 年 12 月，他以年高体弱为由提出辞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请求。勃列日涅夫 12 月 9 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对米高扬进行了称赞，用许多恭维的语言表扬米高扬。在一个极为隆重和讲排场的仪式上，米高扬正式卸去了国家元首的职务。当时，人们激动地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最高苏维埃授予他第 6 枚列宁勋章。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这般荣耀地引退：不仅继续保留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的席位和党中央委员的席位，还在克里姆林宫给他保留了一间办公室。

米高扬及时而平安地离开了苏联神秘的权力中心。许多人只知道极力钻入这是非之地，却不知道如何钻出来，而米高扬既能钻入政治核心，又能安然无恙地急流勇退，实属政治上的成功典范和运用权力的大家。在 1966 年党的二十三大和 1971 年二十四大上，他都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但他再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了。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米高扬对国家事务的关注越来越

少。他无意同勃列日涅夫或柯西金会面，也不曾到赫鲁晓夫府上造访。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共中央曾决定中央委员会里所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在党内 41 万个基层组织中根据本人的愿望,任选其中之一作为自己的党组织关系的所在单位,米高扬的组织关系落在了“红色无产者”工厂。退休后他继续参加该厂的党内集会和党的代表会议。从 1975 年起，米高扬不再参加最高苏维埃的工作，实际上也停止了政治活动。他没有参加 1976 年的二十六大，因而也没有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他其乐融融地与家人住在一起，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寸光阴。

1978 年 10 月 21 日,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与世长辞，此时还有一个月就是他 83 岁生日。米高扬的毕生经历对世人极富启迪。在苏联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他宦海沉浮，是苏联为数不多的政治成功者。他在政治上一向是福星高悬。他处事精明，手腕灵活；在外交领域，他游说斡旋。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他是四朝元老。早在 1919 年米高扬就入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尔后又跻身于苏联中央执委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直到 1974 年他才辞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的职务。他在苏联政界最高阶层中雄踞各种要职达 55 年之久，他在党内担任中央委员也长达 54 年（1922 年 3 月—1923 年 4 月,他曾是党中央候补委员），他在决策中心——中央政治局整整 40 年。这种非凡的经历只有伏罗希洛夫才能比拟。他之所以有这样长的政治生命，是因为他有卓尔超群的政治家素养，还有在风云骤变的政治环境中迅速应变的能力和对政治风向准确的判断能力。曾有人这样说他：某日,米高扬正在朋友家做客，忽然外面雷雨大作。尽管如此，米高扬拔腿就要回家。朋友马上劝阻他：“你不能走,雨这么大,你又没拿把伞!”米高扬却答道：“别担心,雨淋不着我,我能在雨点之间躲闪穿行。”[11]

第 3 节　三驾马车体制的形成和运作

新领导班子宣布党的路线不变

轰轰烈烈的赫鲁晓夫时代结束了。新的领导人会实行什么政策？勃列日涅夫向世人宣称，党的政策不变，给人以定心丸。10 月 19 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第一次正式亮相，这次亮相是出席欢迎宇航员大会。他说："我们党第 20 次、第 21 次和第 22 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我们党的总路线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⑫勃列日涅夫提出苏联国内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发展苏联社会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苏联人民的福利，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从这里，人们看不到新的苏联领导班子会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所说的都是比较空洞的东西。柯西金也说："我们的一切成绩，都是由于实现第 20 次、第 21 次和第 22 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以及苏共纲领所规定的党的总路线的结果。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它是不可动摇的。"⑬《真理报》还发表编辑部文章，郑重申明苏共"始终不渝地执行着"并"永远忠于"第 20 次、第 21 次和第 22 次代表大会所拟订的、在苏共纲领中得到反映的列宁主义的总路线。"⑭

10 月 25 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等同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等领导人举行会谈，着重向波兰领导人通报赫鲁晓夫下台的背景和原因以及新的苏联领导人的想法。勃列日涅夫等人向他们表示，苏联的大政方针不会有大的改变。10 月 26 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等会见法共中央

书记马歇及其率领的法共代表团。勃列日涅夫等人向法共领导人表示，苏共中央的政策不会因赫鲁晓夫的下台而有任何改变，苏共在赫鲁晓夫时期所公布的一切文件和致兄弟党的信件都是有效的，都不会改变，因为这一切都是主席团同意的。同时，勃列日涅夫还否定了马歇的暗示，即苏共准备与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妥协。

11 月 5 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波德戈尔内、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等会见了周总理。但是，他们明确地表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新的苏联领导人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

进入 11 月，正逢十月革命 47 周年日子来临，这是新任苏联领导人重要的亮相、阐述大政方针的时机。勃列日涅夫发表了讲话，从讲话中看不出与赫鲁晓夫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不点名地指责了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强调要坚持过去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65 年苏共中央还授意发表署名文章，批判苏共正在重新审查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线的说法，强调“由二十大开始的进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不可能也不会重新回到老的做法上去。”⑮

实际上赫鲁晓夫的政策被修改

但是，政策确实在变化。赫鲁晓夫的许多政策被修改，如对州、边疆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进行合并，重新恢复按地区生产特征建立党组织及其领导机关的原则。

1964 年 11 月 16 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把州、边疆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的决议：

第一，为了加强党及其地方机关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更加顺利地解决每个州、边疆区及共和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发

展的任务，认为必须恢复按地区生产特征建立党组织及其领导机关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党的第 22 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苏共党章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在原被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州和边疆区,恢复统一的州、边疆区的党组织，把州和边疆区的所有共产党员，不论他们是从事工业工作，还是从事农业生产，都联合在一起。边疆区、州的党组织建立统一的边疆区、州的党委会。

第三，必须把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党委会改组为区党委会，集中对各级党组织，包括对该区的工业企业和建设单位党组织的领导。撤销以前在农业地区、州中心和共和国中心建立的工业生产（地区）党委会。

第四，凡是恢复统一的边疆区党委会和州党委会的边疆区和州，于 1964 年 12 月分别举行党的代表会议，选举相应的党的机关。

第五，赞同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的关于合并边疆区、州的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办法的建议；委托中央主席团研究和解决有关在边疆区和州建立统一的党及其领导机关以及有关恢复统一的苏维埃机关的一切组织问题。

之所以这样做,《真理报》解释说:"生活并没有证实这种改组是适宜的，这种改组是在缺乏应有的准备，不考虑它的全部后果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地、匆匆忙忙地进行的";把党组织分为工业的和农业的，引起了许多困难和麻烦。改组同生活发生了矛盾。生活表明，实践上不可能划清工业党组织同农业党组织的活动范围。用所谓生产原则代替按地区特征建立党组织的原则，客观上使党政机关和经济组织的职能、权力和义务相互混乱，使党委会代替了经济机关。改组的结果，作为行政经济单位的区，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应付不过来。"[16]

这次全会还选举彼·叶·谢列斯特、亚·尼·谢列平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选举彼·尼·杰米契夫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